

曹积三——著

红玫瑰 —— 献给艾青的

曹积三
随笔录



银幕，是用真善美的内容展现生活的诗情、诗意；诗，也恰如电影一样，写出美的意境、美的画面来，才能打动人。电影，是银幕上的诗；诗，是纸上的电影。

主题导读

本书描摹艾青、夏衍、田汉、梅兰芳、张大千、汤晓丹、白杨等文化精英之人文情怀、性格品德、精神气象，彰扬其为传承、发展、弘扬民族文化所做出的非凡成就；呈现赛珍珠、海明威、马克·吐温等世界文化巨擘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怀及其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之巨大影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献给艾青的红玫瑰：曹积三随笔录 / 曹积三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11
ISBN 978-7-206-19677-5

I. ①献… II. ①曹…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240704 号

选题策划：陆 雨
责任编辑：韩春娇
封面设计：上层品牌

献给艾青的红玫瑰——曹积三随笔录

XIANGEI AI QING DE HONG MEIGUI——CAO JISAN SUIBI LU

著 者：曹积三

出版发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印 刷：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5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9677-5

版 次：202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2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献给艾青的红玫瑰·····	001
夏公：大爱之旗帜·····	005
国魂田汉·····	011
梅兰芳之银灯华影·····	017
青城山下忆大千·····	028
美名压枝赵清阁·····	032
望乡的胡蝶·····	039
非凡林杉·····	047
白杨书房·····	052
民族电影音乐之父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	058
谢添：一生快乐著风流·····	070
文隽画雅·忆高莽·····	085
金焰：别具风神“驸马爷”·····	093
飘然而去的石挥·····	099
画茶花女的“酒仙”·····	107
滹沱河畔的血性汉子·····	113
扶风沐雨话梅翁·····	119
汤晓丹：品如苍竹艺如兰·····	125

夕阳山外山	131
赵丹：愿天下人都乐	135
雷振邦：追逐天籁的大师	142
林农：一生都在出征	147
钱君匋之雅趣	152
大伽李準的段子	156
豪放巨子洪深	162
瓦尔登湖寻梭罗	169
去基韦斯特看海明威	174
特拉华河畔的钟声	181
《飘》之城	190
走进海明威的书房	195
秋谒马克·吐温	200
桃树街 979 号	205
因了一个人，迷上一片海	209
绿色山庄的赛珍珠	214
后 记	219



献给艾青的 红玫瑰



作者（右一）与艾青（右四）、高瑛（右三）伉俪

13年了，那束红玫瑰，依稀仍在眼前灿灿地绽放着。

按说，送仙逝者驾鹤西去，应献白色或黄色的菊花，可我觉得，艾老是浪漫的诗人，更是世俗的反叛者，他一生追逐太阳，为光明战斗，为光明歌唱，献一束充盈着太阳颜色的红玫瑰更为合适。

于是，那天，我捧着一束如火的红玫瑰，赶到东四13条97号艾老的府上送他远行。

高瑛大姐对我说：“艾青喜欢红玫瑰，他在天堂里看到你的花，会高兴的。”我感到一阵宽慰。

后来得知，艾老走后，赶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所献之花，在清理时满满地拉走了两卡车，还没有运完。可以想见，有多少爱他的读者和朋友，有多少颗虔诚的心！

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因读到《大堰河》而晓得了艾青这个名字。岂料这位可敬的诗人命途多舛，“潘多拉的匣子”一直伴随着他。他的诗集也一度被图书馆“禁借”，为此，我曾倍感困惑和惆怅，但不管有人怎么往他身上泼污水，那些美丽的诗行仍令我的心头发烫。值得庆幸的是，云谲波诡里，虽经七灾八难，他终于挺了过来，如同涅槃的凤凰。然而，直到1988年的初秋，我才得以见到心仪多年的诗人。

那是一个下午，北影有个剧组开机，约我去探班。

告说，拍摄地点在东城丰收胡同21号四合院。

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艾老的家。

这房子，是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艾青用他的稿费购置的。1957年“反右”后，诗人带着家眷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南横林子，又去新疆的八连等地，经过21年的颠沛流离，在王震将军的关照下，才又重新回到这里。

处于京华一隅的这个小院，像是远离尘嚣，别有一番天地，它静谧、安适，特别是那斑红灿烂的花木和葡萄架上缀满的果实，更平添了几分温馨。

拍戏，是桩扰人的活儿，把原本整洁的院子弄得很凌乱。艾老的夫人高瑛大姐秉承了我们胶东人的性子，古道热肠，对此毫不介意，还替剧组找东拿西，不停地张罗着……

小憩时，她从葡萄架上剪下葡萄，请大家尝鲜。

就在这时，我望见艾老透过书房的窗子，正笑吟吟地望着我们。

我急忙去向他问好。

那天，艾老身着中山装，笑容可掬，毫无凌人之势，热诚得如同相识多年的朋友。我们聊起了电影，他告诉我，他很喜欢电影，在延安的时候，放的是几部苏联的原版影片，没有翻译过来，一边放一边由萧三翻译，人们看得津津有味。如今，我国的电影进步很大，可惜，他眼力不济了。

我探问艾老：“诗和电影，您更喜欢什么？”

他微笑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艾老对于电影与诗的意见是独到而深刻的。

他说：“电影与诗，尽管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本质上是相通的。银幕，是用真善美的内容展现生活的诗情、诗意；诗，也恰如电影一样，写出美的意境、美的画面来，才能打动人。电影，是银幕上的诗；诗，是纸上的电影。”

说得多么的精当，点到了诗与电影的真髓。

我告诉艾老，我自小就读他的诗，从背诵到理解，再到渐渐悟懂，一路相随。觉得艾老的诗不仅富有哲理，而且有画境，就像一幅幅电影的定格镜头，叫人遐想无限。

他笑了。

摄制组在艾老家拍了好几天，有时折腾到夜里很晚，高瑛大姐觉得拍电影的年轻人太辛苦了，便心疼了。不但没有厌烦，还精心做了好几顿她拿手的打卤面招待大家。

那些天里，艾老忙完自己的事情，总是坐在廊下的椅子上，饶有兴趣地观瞧着人们的劳作。这倒使组里的人们有机会和崇敬的诗人一起合影，留下珍贵的纪念。

艾老夫妇对电影的喜爱与支持，让人心里暖暖的。

1990年春天，编罢《中国影人诗选》，想到这是史上首部电影人的诗歌大成，序请阳翰笙先生写就，封面题字非艾老莫属。

我便把想法告诉高瑛大姐，大姐爽快地说：“我去给你说，艾青肯定会答应的！”

艾老果然满足了我们的心愿。

当我拿到艾老的墨宝，心里充满对艾老和高瑛大姐的感激！谁能料想，就在艾老为《中国影人诗选》题签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90年3月21日，他去中纪委招待所参加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扩大会议时，跌倒在洗手间里，右臂不幸骨折。最后，时年八秩高龄的艾老，不得不切除了右肱骨头，装上了假体。此后，

再也无法自由运笔，挥毫题字了。

《中国影人诗选》竟成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题签，这是艾老与电影人的莫大缘分！

当我再去拜望艾老时，艾老满面春风，没有因为胳膊里装了假体而沮丧，尽管有说不出的痛苦，但坚强、坦然、幽默依然。

高瑛大姐告诉我，艾老曾与探望他的诗人邹荻帆有过一番苦涩的趣谈，他说：“我这个人真奇怪，老是在右边出毛病。1959年在农场割麦子，右腿膝盖被镰刀割了个大口子，一个多月不愈合，腿连弯都不能打，就更不用说走路了，受了不少罪。1988年在自己家小院里跌了一跤，右眼眶起了个大疱，引起脑血肿。这一次又摔断了右胳膊，真是太巧了，都是发生在右边。”

说罢，朗然一笑。

艾老笑谈天灾人祸，罹难从容，风雨淡定，好一个豁达人生！

艾老走了，已经13年了，但悠长的岁月抹不去对他的敬重和怀念。

这敬重和怀念，就是我们献给他永不凋零的红玫瑰。

（载2009年8月《文汇报》“笔会”）



夏公：
大爱之旗帜



对夏衍先生，人们都爱称其夏公，既有亲切，更有敬重之意。

20世纪30年代，他便是上海地下党的电影领导小组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电影方面的领导职务，“文革”后，他仍是电影工作的主心骨。从左翼电影到红色经典时代，他是新中国电影的带路人，也是一面大爱之旗帜；他有丰富的创作实践，也有服众的著述，更有培养人才的成就，电影人视其为权威。

张骏祥先生对夏公有一妙比：“中国电影的老保姆、老园丁”，恰如其分，岂有他哉！

夏公的创作思想影响了几代电影人；其作品也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

其实，他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开路人、领导者，更是老资格的职业革命家。20世纪20年代初，赴东瀛留学期间，就经孙中山介绍，加入革命营垒。1927年，他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长期开展地下斗争。在极为险恶的环境中，为人民立下许多不为人知的功勋。他是条“大鱼”，敌人无数次撒网捕捞他，一次都没有成功。可谓遇险无数，九死一生。

他将从事的电影工作视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从开场戏《狂流》开始，到后来的《春蚕》《前程》《上海二十四小时》《脂粉市场》等，他始终把阶级压迫下的苦难民众作为关注的焦点。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百姓的疾苦与挣扎、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抉择成为他作品的主题。

特别是当中华民族面临灭族灭种的危亡之际，他怎么可能将电影变成宣扬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劳什子，而必然将其变为唤起民众、奋起反抗、决绝战斗的鞞鼓和号角。他为田汉充实的剧本《风云儿女》，以及《同仇》《白云故乡》《时代的儿女》《自由神》《女儿经》《压岁钱》等都是这样的热血之作，时代之声。

夏公的“武器”，除了电影，还有报告文学和话剧，如《包身工》《心防》《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等等。他在银幕和舞台上，两栖作战，都是心系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充满对人民的大爱，跃动着一颗赤子之心。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一生是与祖国命运、人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年轻时，我即把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当作理想来追求。回首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在夏公的电影花地上，有一片奇葩格外耀眼，那就是他改编的作品。

改编名作家的名篇是夏公的拿手好戏，堪称绝活。20世纪30年代的《春蚕》，由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风雨江南》，则改编自葛琴的小说《结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相继把鲁迅和茅盾的小说《祝福》《林家铺子》搬上银幕。随后，又将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成《革命家庭》，将巴金的《憩园》改编成《故园春梦》，将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改编成《烈火中永生》。这些作品，都是中国电影红色经典时代的力作，有的堪称经典。

夏公之改编，绝非依样画葫芦，既忠实于原作精髓，又不被原作所束缚，总是依据自己的审美精神和生活体验，对人物和情节加以独特的创造，赋予时代精神，使作品有所升华，或开掘出深一层的主题意义。

他在改编之后，常有深沉的凝思，写下经验之谈。诸如《杂谈改编》《谈〈林家铺子〉的改编》《漫谈改编》《对改编问题答客问》等等。

这些对实践的审视、剖析和总结，既形成了夏公自己的理论，也为后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放眼影坛，对于改编，既有系统的理论建树，又有丰富的成功实践，将二者结合得如此完美者，唯夏公独步。

著名导演如谢铁骊、王家乙、谢晋、桑弧等都沐浴过他的恩泽。

对谢铁骊原名为《二月》的剧本，改动有160多处，最后，将剧名加上“早春”二字，也是由他建议的。在分镜头剧本上，他再次提醒道，将《二月》还是改为《早春二月》为好，点出“早春”二字比较醒目些。同时，还对剧中人物的拿捏把握提出中肯的建议，譬如对于钱正兴这个人物，就提示不能将他处理得很轻浮滑稽，更不宜丑化，等等。

《五朵金花》导演王家乙告诉我，剧本初稿写的是金花十二朵，夏公摇头道：“多了，只写五朵。”随后，作者边写他边改，直到开机。对于影片的整体构想，夏公言之凿凿：“拍一部轻喜剧。要好看，耐看，人人爱看。别摆架子说空话，政治口号会让人疏远，片子里不要喊了。”王家乙一听，有些惊讶，夏公一脸的笑：“你只管拍，出了问题，我负责！用不用我写个条子？”王家乙连连地摆手。



影片《五朵金花》剧照

王家乙拿着“尚方宝剑”，率领摄影王春泉、美术卢淦、作曲雷振邦等一千人马，乘着一条独木舟沿澜沧江顺流而下，去橄榄坝接地气，又去大理三月街、蝴蝶泉等处采风……他们终于采撷到生活中的芬芳，将一部人美、歌美、景致美、人情美的影片呈现在观众面前。

影片映出，一个美字惊艳了影坛。不仅赢得国内的观众，也受到海外影迷的追捧，它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映出，创下当时国产片在海外发行的最高纪录。

在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王家乙赢得“最佳导演”的盛誉，主演杨丽坤捧得“最佳女演员”桂冠。

夏公的创作，并非顺风顺水，曾承受过巨大压力，甚至被威胁、被批判、被罢官。

对于将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搬上银幕，康生就再三阻挠，开始称不知道有陶承这么个人，言外之意她是假的，不真实；继之，又声言回忆录所歌颂的是错误路线，并威胁道：“片子拍成了我也不看！”

夏公不以为然，反驳道：“即便在错误路线时期，为党牺牲的同志，我们也应该铭记他们，学习他们那种勇敢地为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精神。”

康生并未就此罢休，1962年12月，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由此展开对夏公的围剿。

夏公精心扶植的《早春二月》，成为炮制“大毒草”的证据；倾注夏公激情的《烈火中永生》，遭到他们的横加挞伐。

夏公呕心沥血创作的一部部优秀影片都变为他的“罪状”。



影片《革命家庭》剧照

就这样，夏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他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也被罢了官。

在电影艺术家中，夏公是最有名望的革命家；而在革命家中，他是最有成就的电影艺术家。

夏公是集大爱、小爱于一身的人。生活中，他有许多雅好，爱猫、爱集邮、爱画、爱花，充盈着诗情。

夏公爱猫如子。他曾有过一只非常疼爱的大黄猫“博博”。“文革”中他被抓走后，猫咪一直等着主人回来。“博博”很有灵性，一遇到“造反派”来抄家，它就赶紧爬到树上，或蹿上房顶藏起来。“博博”天天等着主人归家，整整等了八年零七个月，等得它不能进食了，仍坚持在家里等着，等着，终于等到主人出狱的那一天。当夏公拄着拐棍回到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博博”神也似的站了起来，跑了过去，用身体擦蹭着夏公那条被打折过的右腿，“喵喵”地叫着，眼里透出无限的眷恋……

第二天，它便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为此，夏公伤心多日。

夏公是位集邮大家。他藏有1878年我国印制的第一套邮票清代龙票，包括大龙票、小龙票和红印花票，皆为稀世珍品，价值连城。他把包括这些邮票在内的233件珍贵邮品，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与此同时，夏公还把珍藏的“扬州八家”稀世珍品25件，齐白石30件及吴昌硕、黄宾虹等名家101件书画，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他把自己的小爱奉献给了大爱。

因工作的机缘，我得以多次见到夏公，他的讲话总让人长见识，叫人感到新鲜。凡抨击时弊，令你振聋发聩。

编《中国影人诗选》时，我收录了1984年夏公致宋振庭信中的那首打油诗《整人》，这虽然是一首打油诗，内涵却不可小觑。这是夏公对整人的厌恶、反思和省悟。纵观几十年风云变幻，他荣辱沉浮，透过这诗，可窥见其内心的坦然、淡定和从容、达观。

那一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电影界的重要座谈会，我担任记录。会议结束后，送夏公回去，同他握别时，觉得他的手很有力量，让我很惊讶；更惊讶的是，他拉着我的手，问及我的工作和写作的一些情况，激励和关爱尽显其中。夏公尽管身系要务，却还挂记着下面的工作人员，叫人顿生感慨。

1995年2月6日，享年九秩又五的夏公溘然长逝，以他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中国电影的红色经典时代告一段落。

可我的心头，一直响着阳翰笙先生在为《中国影人诗选》作的序言中，引用夏公的那首诗：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了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贤者。
天快亮，
我们颂赞我们的英雄。
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
疲惫了的圣·克里斯托夫，
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这累人的，
快要到来的明天！

他没有走，在银幕上，在书卷中，在心庭里。
百年夏公，一个大写的人，矗立在天地之间。

（载2020年11月《文艺报》）



国魂 田汉



田汉与夫人安娥雕像

现代中国，艺苑巨匠，倘有不朽者，当数田汉。

在他的人生回放中，有两组镜头，令人颇为感慨。

A组镜头：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随之，天宇间响起悲怆、雄浑、激越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观礼台上，它的词作者田汉作为革命有功之臣，文化精英代表，欢欣鼓舞，感受这开天辟地的一刻。

金水桥下，其长子田申担任华北坦克团代团长，率领战车团隆隆向前，接受检阅。

田汉望着万众欢腾的广场和那滚滚的铁骑，激情澎湃……

B组镜头：1968年12月10日，京城囹圄般的医院。

沉痾在身，极度衰弱的田汉，哀求看守，允许他见90岁的老母亲最后一面，只看一眼，遭到痛斥而不准。

他被“叛徒”“特务”双料加身，饱经摧残后，与他深爱的共和国黯然诀别。

巍巍国魂，莽莽田汉，轰然倒下，其遗躯竟冠以“李伍”之名，焚于烈火。

凤凰涅槃，飞向了天国。

此时，街上的大喇叭正在播放歌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祖国的栋梁……

这是为欢送那一队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播放的。

他们也许并不晓得，这《毕业歌》的词作者，正是“罪大恶极”的田汉。

豪壮的歌声，响遏行云，好似在为抗战时期曾资助和指引许多文艺青年投奔延安的“田老大”、当代的关汉卿壮行。

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其实都是电影歌曲，它们分别出自影片《风云儿女》和《桃李劫》。

1934年年底，田汉便在上海投入《风云儿女》的创作。剧本讲述了流亡诗人辛白华和挚友梁质夫所走的抗日道路，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从

苦闷、彷徨到醒悟，奔向革命的内心嬗变。

剧中由袁牧之饰演的诗人辛白华写有一首长诗《万里长城》，其中的一节，便是后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2月，剧本刚刚杀青，田汉即被反动当局逮捕，押解南京。作曲家聂耳闻讯后，找到党的电影小组组长夏衍，主动请缨，为影片谱曲。

是年7月，田汉被营救出狱时，由许幸之执导的《风云儿女》已经公映。

田汉欣慰之际，惊悉聂耳在东瀛不幸溺亡，悲恸至极，想不到《义勇军进行曲》竟成他们二人合作之绝响。

田汉看到聂耳对其歌词作了些微的改动，原词中“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而“前进”后面，又增加了个“进”字，以强调语气，增加节奏感。看罢，他暗暗叫好。聆听着聂耳的曲子，他不禁双眼盈泪，深感聂耳极完美地体现了自己所要表达的民族呐喊与怒吼；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意志与精神。

他多想对聂耳表达感激之情，怎奈阴阳两隔！不禁悲从中来，他脱口吟道：

一系金陵五月更，
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
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共狂涛返，
好与吾民说不平。

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放映，《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迅速传遍中华大地，在民族危亡之际，成为激励中国军民团结救亡的号角和鼙鼓，足以告慰聂耳了。

画家徐悲鸿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万分感慨，称：“消沉的民族里，乃有田汉的呼声，闻其词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教育家丰子恺曾描摹这样的情景：荒山野岭的小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